



为什么说上海是红色歌曲孵化地

◆ 徐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当时,上海就拥有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同时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工业——相应地,工人阶级觉悟也最为先进。这片热土还汇聚了大量追求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辅之以发达的新闻出版业、电影业,以及因此带动的唱片业……在各方势力纠葛之际,在中西思潮碰撞之际,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寻求生机之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从此,这座城市被注入了伟大的红色力量,勇往直前。

在这股洪流中,上海涌现了以人民音乐家聂耳为旗手的一批进步音乐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和反抗被压迫的斗争中,这些红色歌曲也化为一股战斗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上海先后成立了由田汉和聂耳牵头,包括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在内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组织,这股力量同时也鼓舞了在上海学习就业的冼星海、贺绿汀、麦新等音乐家的创作。于是,聂耳写出了中国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以及《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麦新写出了《大刀进行曲》,任光创作了《打回老家去》,张曙则有《丈夫去当兵》……

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的师生也是这股民族大义中的生力军。其中,黄自教授写出了《抗敌歌》,学校培养的学子吕骥创作了《自由神之歌》,冼星海有《救国军歌》,刘雪庵有代表作《长城谣》,贺绿汀写出了后来人人会唱的《游击队之歌》,夏之秋与桂涛声合作了《歌八百壮士》等。

从上海发出的红色音符,与前线的战斗进行曲和根据地红色歌曲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民族精神。其中,上海的红色歌曲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聂耳为代表的音乐家创造性地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作品时,深入码头工地,观察体验工人的工作场景,把低沉的号子声作为歌曲的有机部分来呈现。在这之前,中国工人阶级从没有如此有

力量的、鲜明的、精神层面的音乐艺术呈现。第二,通过电影和唱片达到最广泛的传播。聂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电影插曲,冼星海最早期的《夜半歌声》等作品都是电影歌曲。电影可以说是当时最佳的传播方式,而往往由电影明星演唱更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另外,电影歌曲又具有通俗易懂和时代流行曲的风格。电影歌曲大都被录制唱片发行,《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重新编曲录制唱片发行后,影响力大增,以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听到后改编成英文版本的歌曲《起来》,在多个场合演唱声援中国抗战。第三,海派风格鲜明。从各地来上海发展的音乐家,吸收了上海的国际潮流和都市风情,融合他们擅长的地方民歌和特色,呈现出时代性,而彼此叠加出来的海派气象蔚为壮观。无论是作品本身的风格还是包装,在红色经典歌曲里都具有独特魅力。譬如贺绿汀的《天涯歌女》《春天里》,安娥、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等都是生动案例。第四,音乐艺术性比较高。这个方面更多的源自“学院派”,譬如音专高材生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等,以及在上海生活的外国音乐家的协力,譬如《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唱片时邀请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担任了配器。

1938年鲁艺成立,冼星海和吕骥欣然赶赴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鲁艺的音乐系负责人。他们不但在延安的革命氛围中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恢弘的时代作品,更是通过在上海积淀的功力培养了大量音乐家,其中有马可《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刘炽《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郑律成《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王莘《歌唱祖国》,李焕之《社会主义好》《春节组曲》,时乐濛《歌唱二郎山》等等。这些根植于九州大地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主旋律,宣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辉煌。

所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起,上海就逐渐成为了红色歌曲的孵化地。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金牌绿叶难以跨越的,唯生死

◆ 吴翔

3月28日,2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的演员廖启智因病离世。人们在惋惜失去一位“金牌绿叶”的同时,更在为他人生路上披荆斩棘的勇敢而鼓掌。事业上,吞风咽雨葬落日,他也未曾彷徨;生活里,欺山赶海践雪径,他也没有绝望。唯有生死这道难题,让人无可奈何。

也许提到廖启智的名字你并不熟悉,但你一定看过电影《杀破狼》的一个片段,廖启智和任达华饰演的刘国忠吃饭,任达华说:“我得了癌症”,廖启智顿了顿:“哪里啊?”“脑袋。”“有的治吗?”任达华回:“不知道。”“那就是没事了……”任达华吃完面,洒脱地说,“吃完出来做事啊!”廖启智低着头快速地夹盘子的食物,盘子里空荡荡的,随后砸了杯子。全程不到一分钟,廖启智的表演让人回味无穷。

演戏这道题,廖启智出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他第一年报考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就落榜了,两年后已经24岁的他决定重考,才进入了科班。当时的廖启智还被评委老师评定长相“太丑”了,还说他的表演太过生硬,不适合当演员。这些充满刺激性的话语让廖启智感触很大,却没有击倒他。演技差,我就练演技,长得丑,那我也长得特别,演不了主角也能演配角,哪怕是反



东方戏曲审美里的现代性——评越剧《山海情深》

◆ 考拉

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邀约,上海越剧团以脱贫攻坚为题材,重磅推出现代戏《山海情深》,日前开启全国巡演之旅。擅长以委婉越音描画情爱的百年剧种挑战反映当下社会状况的扶贫题材,这本身也是戏外的一场攻坚战。

夜色深幽,留守苗寨的妇女们因新米节围聚在一起,如今大家不愁吃穿,却愁外出打工养家的男人常年不在家。反复悲切吟唱“我想有个家”“一个圆满的家”“夜夜想个他”“夜夜梦个他”“回来吧”……这时的舞台是幽暗深沉的,写意的泼墨色彩与精细的勾画线条,展现出抽象凝练的光影视觉语言。蓝紫色的光自夜幕底透出,配合低位流动水色,使得场景阴柔秀丽,也呼应出苗女心境。用灯光准确表达情绪,并不脱离剧情所需的氛围,不把情绪过分夸张地外化,这是萧丽河灯光艺术具有的现代性。传统戏曲的灯光讲求情绪色彩的渲染,借用生活中夸张感的光源效果,如篝火、月夜、电闪雷鸣、阳光等为剧情发展营造情境;而《山海情深》的灯光吸纳了传统戏曲灯光手法,延续着其现代性表达,又更多一层符合东方审美的现代装饰画的美学追求。

有着留美学习工作经验的萧丽河,这样表达着自己对灯光的理解:“让人物生活在灯光营造的整体环境中,让光从全方位包裹,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却不被刻意看到。灯光所塑造的

派!然而因为形象不够惊艳,廖启智一直没有接到过什么好的剧本甚至通告都少到可怜。直到1980年,廖启智终于在《上海滩》中得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有名有姓的角色——陈祥贵,也是因为那部剧,让他和周润发情同兄弟。

四十年来,他在镜头前交出了答卷:《无间道II》《杀破狼》《证人》《反贪风暴》……并凭《笼民》《证人》两次拿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他说,“永远都没有满意的角色,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在《无间道II》中,廖启智演的黑帮人物杀人之后,拿出口琴吹奏《友谊天长地久》是全片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是他要求加的。“原本剧本里杀完人是去抽烟,但我不擅长抽烟。有一天,我和太太、儿子去逛商场,看见有卖儿童口琴,我想起小学时学过,就买来玩,想着用口琴代替抽烟也不错。”

带着老婆孩子逛逛商场,吹吹口琴,听上去幸福满满,然而生活给他出的题,比磨练演技要难上千万。廖启智和妻子陈敏儿共孕育了三个孩子,对比前两个儿子的健康和活泼,小儿子廖文诺自出生时就经历生死,还是医生的一番抢救才从死神手中抢回了母子二人。结果2003年,小儿子诺诺又被查出患血癌,一年的治疗控制了病情,不久后,诺诺的身体却排斥移植的骨髓。2006年,年幼的诺诺终于支撑不住,离开了人世。在小儿子离开的第二天,廖启智习惯性夜里为儿子盖被子时却看到空荡荡的房间,哭得像个孩子。

但他没有更多时间去哭泣,巨额的医疗费用让廖启智四处奔波拍戏,其间妻子陈敏儿还患上了抑郁症,这个时候他的大儿子居然有了“想当女人”的想法。一次次的打击没有打倒廖启智,相反的,经历了太多苦痛的他反而释怀了。2009年,小儿子过世后的第三年,他第二次笑着捧起金像奖奖杯:“诺诺,这是你和爸爸共同的奖。”

人生总是有太多的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廖启智是个勇士,从来不怪上天对他的不公,只想把自己做到最好。他在查出胃癌的时候安慰了粉丝和朋友们,称自己只是“机器老了,需要保养一下,还会再回来”,然而却没有了再会!再强的勇士,也要面对无可阻挡的别离。

人物和环境,追求的是‘最准确’而不是‘最漂亮’。然而,这跟要将剧中角色表演的一招一式以及表情看得清清楚楚的戏曲灯光表现手法有差异,处理不好就会顾此失彼,失去重点。这便要求灯光师更高的把控能力,正如萧丽河所说的,“各种光的角度计算要更细致精准,工作的复杂度更高,工作量更大。既要角色突出被看到,也要有丰富立体的环境质感。幸运的是现在灯具设备不断更新换代,让艺术创作追求的高标准能够得以实现”。

传统戏曲舞台仅以一桌二椅,通过人物行头、唱词、动作,以及观众的想象,表现出各种客观环境;而现代剧场则通过舞台美术、灯光设计,加之投影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呈现视觉极大的丰富的剧场艺术。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扶贫干部蒋大海心急如焚赶往苗寨,希望劝说应花婆婆到苗寨脱贫竹艺项目面临的危机施以援手。舞台上灯光在投影技术的帮助下,逼真地营造出竹林雷雨即视感,以至于现场有观众真以为下雨了,抬头望向剧院天花板。灯光对环境的塑造力可见一斑。在演出中多次用灯光切割出舞台空间,既配合布景表现黔地山路崎岖,又暗合曲折波澜的人物情感发展。光影创造出的意境、心境、情境让观众感沉浸在舞台艺术的魅力中,收获精神世界美的洗礼。